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渐进式改革等政策的实施，中国进入了转型经济时期。产业组织结构由国家垄断向市场竞争的转变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鲜明特征，中国的企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和挑战。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市场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力量，但是政府的调控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决定着大型企业在经济体系中依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对企业所在城市发展起着深远影响。

传统企业增长理论强调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投入要素的重要性，而现代企业理论则更加关注企业所处环境，如区域制度、产业特性等对企业增长的影响。长期以来，大量关于企业增长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影响企业增长的因素众多，大量实证研究关注财务风险、管理体制等因素对企业增长的影响，而对于企业所处环境对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较少。另外，由于计算机和电子技术对传统制造方式的替代，企业规模经济逐渐减弱，西方经济地理学者更加关注中小企业增长的研究，涌现出大量关于中小企业增长的实证研究，并发现小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更高，增长也普遍较快。

对中国而言，大型企业占有大部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各类支持，在城市经济体系中往往也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大型企业的增长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并且通过拉动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等形式推动城市全面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大型企业的增长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企业增长，也可以为地方政府制定企业发展等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不容忽视的是，大型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本文引入地方政府竞争、集聚外部性、产业技术关联等理论，基于 1998-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计量模型分别探究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大型企业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自身规模经济效应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少从城市环境其他因素中获益，而大型企业的增长对于城市整体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现实层面，本文通过对大型企业增长的整体描述为全面理解我国大型企业增长提供经验证据。本文使用 1998-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微观企业层

面计算全部大型企业增长率，描述其时间演化特征、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区域特征与产业特征，从而全方位展示我国大型企业增长的特征。本文还将全部大型企业按照企业成立时间和企业所有制分为四类，分别探讨老国有企业、老非国有企业、新国有企业和新非国有企业之间增长的差异，以及它们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本文还引入地方政府竞争、集聚外部性和技术关联等理论，探究城市环境对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探究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深层机制。同时，本文也将分析大型企业增长对所处城市发展的影响，从而为中国城市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及产业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在理论层面，本文为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发展间关系及其影响机制提供实证检验。由于缺乏微观层面的数据，已有研究大多关注中小企业的增长，且更加注重研究企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缺乏对企业增长背后的作用机制的分析，关于企业增长与城市发展间的关系研究也相对匮乏。本文将构建大型企业增长与所处城市之间关系的模型，通过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强度、集聚外部性、技术关联对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及大型企业增长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揭示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发展之间的深层机制。此外，关于中国企业增长的实证研究忽略了企业异质性，本文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等三个角度分析企业自身特性对于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并根据企业成立时间和企业所有制将全部大型企业划分为四类，为企业增长理论提供中国的实证依据。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型企业增长时间演化特征的分析，发现 1999 年-2009 年我国大型企业平均增长率经历了先缓慢增长，又出现倒退的过程。并且大型企业增长存在区域与行业差异。通过对大型企业增长空间分布规律的分析，发现中国大型企业增长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本文尝试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所有制三个角度探究企业自身特征对于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年龄越小，中国大型企业的增长越快，即企业增长不独立于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所有制对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相对更为复杂，其中国有企业的增长率明显偏低，而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增长率相对较高。此外，国有企业明显集中在采掘业、能源电力行业，在不同行业的布局不平衡，整体布局偏重。本文又对制造业 37 个两位数行业进行了检验，发现超过半数行业内的大型企业的企业增长独立于企业规模和

企业年龄，有部分行业内的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与企业增长之间遵循一定的规律，且各行业表现出来的规律基本一致。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规律，本文将全部大型企业按照企业成立时间和企业所有制分为老国有企业、老非国有企业、新国有企业和新非国有企业四类。通过对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时空间规律描述分析发现，中国大型企业增长大致经历了先升后降的两个阶段。此外，相同时期成立的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增长率高于国有企业，成立时间较晚的企业的平均增长率略高于成立时间较早的企业，但金融危机对于非国有大型企业的影响更大，国有企业受到冲击后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影响企业增长的因素不仅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等自身因素，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R&D 支出水平等外部因素。本文借鉴地方政府竞争、集聚外部性、技术关联等理论，构建计量模型探究城市环境对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首先引入官员晋升锦标赛和财政联邦主义两个维度探究地方政府竞争对于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于中国大型企业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有促进作用的地方政府竞争来自于以官员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政治集权，而财政联邦主义推动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对大型企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还发现官员晋升锦标赛维度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大型企业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不存在假设中提到的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同时，引入 MAR 外部性、Jacobs 外部性和 Porter 外部性以检验集聚外部性对于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发现集聚外部性对中国大型企业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又引入技术关联变量探究其对中国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技术关联对于中国大型企业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分析城市环境对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大型企业对于城市环境所带来的各类外部性敏感性较低，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自身规模的扩张实现增长。

为进一步探究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引入城市经济水平、城市税收水平和城市投资水平变量，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大型企业增长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说明大型企业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城市 GDP 增长率提升，对于城市税收水平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城市人均 GDP 以及城市投资水平反而会起到抑制作用。可见大型企业的增长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总

量而不是平均水平。

总的来说，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之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 GDP 增长率，且双方呈现出良性互动。即地方政府竞争有助于大型企业增长，相应地，城市大型企业的平均增长也有助于城市 GDP 增长率的提升。而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在税收、投资等其他方面的互动较为薄弱，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有较强激励推动大型企业的增长，而大型企业增长也能够为所在城市贡献 GDP 的增长，帮助城市扭转经济周期等压力。此外，国有企业对于官员晋升锦标赛带来的激励更加敏感，国有大型企业与城市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

本文研究还发现中国大型企业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大型企业通过成立分支机构或者兼并重组等形式实现自身规模扩张，而大型企业对于集聚外部性等城市环境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并不敏感。

中国大型企业的产业上下游联系往往建立在企业内部或者在少数几个企业间，其企业增长与技术关联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见，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之间在技术关联、知识溢出等领域的互动关系也比较薄弱。

通过对企业自身特性的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大型企业增长不独立于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且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对于企业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国有企业无论是成立时间较早还是较晚都明显劣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且集中布局在采掘业、能源电力行业，整体布局偏重。实证研究也显示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偏低。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助于提升国有大型企业的整体表现，对于中国大型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此外，通过不同类别大型企业平均增长率等方面的分析，本文发现大型企业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近年来增长势头较好，建议在未来的产业政策等方面加强对大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扶持力度。

本文重点探讨了以地方政府竞争、集聚外部性和技术关联等为代表的城市环境因素对大型企业增长的影响，并发现官员晋升锦标赛维度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大型企业增长，而财政联邦主义维度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对于大型企业增长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大型企业很少从集聚外部性中获益，且技术关联与大型企业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大型企业对于城市环境带来的各种外部性的敏感度偏低，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适度引导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同时注意保持与大型企业的良好合作，

协调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避免大型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防止大型企业对于城市发展的阻碍作用。

关键词：企业增长，大型企业，城市发展